

## 主編的話

了解香港天主教歷史就是了解香港歷史。從教區文獻記載，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後，香港已設立了傳教區，香港正式與這個西方宗教建立關係，同步成長。來自西方的傳教士開始從葡萄牙佔領的澳門，轉移到香港。自一八六零年代，香港天主教的傳教區擴展至新安、惠陽、海豐及汕尾後，來自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均以香港作為踏腳石進入中國內陸服務。然而好景不常，自一九零零年代以來中國內陸的政治動盪，如義和團及八國聯軍等，使內地傳教舉步為艱。香港因為殖民地的身份，與內地制度分隔，因此政治未受太大衝擊，加上九龍半島的割讓，當地加速發展，半島南端的尖沙咀漆咸道建立了軍營，增加了不少天主教徒(以葡籍教徒居多)，這間接促成了天主教在九龍地區得到長足的發展。民國時期，中國南方發生持續的政治動盪，加上發生多起國民與教民之間衝突的教案，羅馬宗座也派遣了代表於北京設立辦事處，以協調與民國政府的磋商，而香港經歷二、三十年代的經濟萎縮，教會與修會不得不去承擔殖民政府不願拓展的社會及教育工作。1928年公教報創刊，而天主教在民間的聯繫與日俱增，尤其對婦女服務方面增加了不少支持，成為了日後教會在地區推展牧職工作的基礎。1931年，香港仔的華南總修院成立（在1964年由教區重組為培訓本地神職班的聖神修院）。然而隨著日軍迫近，主要為意大利籍的傳教士或本地神父一度成為了敵國公民，有些神職人員更被困在集中營內。

日治時期，根據時任主教的恩理覺的表述，香港的天主教徒從二萬人銳減至只得三千人<sup>1</sup>。然而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堅持繼續傳教及以教廷的援助基金，向受難者提供有限度援助，而且在獲日本當局的默許之下，不少傳教士更深入不受控的新界區域，為照顧當地的基督徒與非基督徒而身陷險境，其中華籍黃子謙神父、郭景芸神父及意大利籍丁味略神父更因為被懷疑以「日本人的合作者」為借口，很可能是被抗日共產黨游擊隊殺害，因而殉道，但至今行兇者未明。

一九四六年，香港連同其他中國代牧區升格為教區後不久便遇上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成功奪取政權後，教區活動只限於殖民地區域，中共當局對仍留在代牧區的傳教士進行迫害，包括白英奇主教在內的傳教士被逐出境，不少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的傳教士都被驅逐回到本身國家或其他地方，但有些選擇留在香港，因此雖然在港服務多年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於1954年退出，在四九年後的三十年裡，香港卻成為不少傳教士繼續傳教及服務的地方。天主教會亦在此時開始本地化工作，1953年白英奇主教成立「香港明愛」前身的「天主教社會福利會」，又於1960年成立教區教友傳教總會（教友總會前身）。在1962年梵二大公會議前，香港教會已在某些方面進行本地化，例如在牧養本地教友方面，於1934年成立的香港公教真理學會早於1950年代已出版多本翻譯自天主教學者的有關耶穌的傳記，如1951年由余先翻譯的《歷史中的耶穌》（原著作者：法國歷史學家Henry Daniel Rops）及1956年由羅馬大學學者黎巧迪（Joseph Ricciotti）著，李焯博譯的《耶穌基督傳》（四冊），均

---

<sup>1</sup> 見 Sergio Ticozzi, *Historical Document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1997), p.171。引自 Akiko Kurata, "The Catholic Church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in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1: Historical Material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pp.274-303.

由主教准印，讓本地教友以中文來了解公教真理<sup>2</sup>。而1967年左派暴動，更催生不少殖民地政策更邁向照顧本地人的需要，而在這種背景下，同年徐誠斌神父被委任為輔理主教，而兩年後更成為首位由國籍神父擔任的香港教區主教，香港教區開始由國籍主教及神職班接管。

1970年教宗保祿六世訪港，此後陸續見到許多梵二所帶來的教會轉變，包括1975年被教宗委任為第五任主教的胡振中神父，他在位二十七載，到了1988年，胡振中主教更擢升為香港教區首位華人樞機。1984年在中英結束香港前途談判後，翌年教區派出訪華團訪問中央，但可惜在1989年發生震驚國際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香港教會因支持中國民運而與北京處於對立狀態，當時胡樞機曾致函全球主教，懇請他們呼籲中國推行法治民主。<sup>3</sup>1991年，教會為慶祝一百五十週年，在掃桿埔政府大球場舉行慶典感恩祭<sup>4</sup>。1997年回歸，人們普遍相信中梵建交指日可待，但由於中國大陸對祝聖主教的態度、宗教自由以及對天主教聖統制的抗拒態度，作為新任樞機主教的陳日君亦未能打開與中國大陸的溝通門戶。

以上的陳述只是對本地教會歷史的一鱗半爪，其實不少有趣題材並未受到重視，包括在鄉村的傳教活動、日治時期教會與日本統治者的關係、深港邊界的天主教歷史、平信徒所組織的商業、書舍、福傳、靈修及善別團體的發展等，這些均並非教會的主流歷史觀點或論述，均很少

---

<sup>2</sup> 公教真理學會亦於1992年由基德多寫成《白英奇主教傳》，對這位在教育及慈善事業貢獻良多的外籍神父作出長達十五章的回顧。

<sup>3</sup> 見《香港天主教會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成立150週年慶典籌委會，1991），頁24。

<sup>4</sup> 同上，頁136-137。

學者觸及<sup>5</sup>。與香港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歷史著作相比，有關早期本地天主教會的著作亦可謂鳳毛麟角。<sup>6</sup>對香港天主教會較為詳盡的歷史研究，基於其組織的複雜內部架構，初期主要是由神職人員開展的。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教區司鐸代表會議已編成《香港教區會議文憲》，而田英傑神父於1983年編著的《香港天主教掌故》<sup>7</sup>，以編年史的方式交代由1841年香港開埠出現的第一份教區文獻到教區歷史檔案，是自天主教會香港發展以來涵蓋年份最長的一本普及歷史讀本，可說是將天主教史呈現給普羅信眾的先驅。但由於它已出版三十多年以上，故此二十世紀後期的歷史未能收錄。在九七回歸之際，田神父編著的《香港天主教掌故》以英文出版，*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除此以外，多個歷史較長的堂區（如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士提反堂、玫瑰堂、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及粉嶺聖若瑟堂等<sup>8</sup>）、修會

---

<sup>5</sup> 有關日治時期的天主教教會的著作包括：Akiko Kurata, "The Catholic Church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in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me,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1: Historical Material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pp.274-303；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1）。而平信徒的這類團體包括塔冷通心靈書舍、靈火天地、臨恩教友服務中心等。

<sup>6</sup> 參見李培德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頁169-176。當時有關天主教歷史的著作凡二十七種，而基督教的著作已達八十四種。雖然現時沒有近十年所發行的數字，從整體來說，但近年不少基督宗派或其轄下的學校或辦學團體均出版不少特刊或歷史研究著作，可見這差別情況沒有太大變化。

<sup>7</sup> 田英傑編，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1983）。

<sup>8</sup> 而其中表表者包括印刷精美的九龍尖沙咀玫瑰堂建堂百週年紀念特刊—《綻放百載》（2005），以及大埔傳教一百五十周年暨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建堂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傳情無間》（2011）（*150 Years of Evangelization in Taipo / 50 Years of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後者更分別出版該堂歷史及現況的一套兩冊紀念刊物，由湯漢主教序言及發行郵票以茲紀念。而歷史冊子共223頁由香港史著名學者夏思義博士（Dr. Patrick Hase）撰寫，中英雙語詳細介紹天主教在大埔區的早期生活、教會在大埔的成長，英國統治下及日軍佔領下之大埔及大埔戰後時期，可說是香港地區傳教史的典範。本書亦罕有地在公教進行社售賣。

及傳教會均曾出版紀念特刊，當中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惜大部份這類特刊是非賣品及只供內部傳閱，一般非有關堂區的教友未能在公開場合借閱或以自由捐獻方式而獲得<sup>9</sup>，這亦間接增加普及歷史研究的難度。同年，由時任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王賡武教授主編的《香港史新編》(下冊)，收錄了由專研中國及港澳基督教會史的李志剛牧師所寫的章節〈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該文章反映出作者對兩個教會在九七回歸中國之後所擔當的角色的期盼，是要對中國教會作出貢獻及加強交流<sup>10</sup>。

而在九七回歸後十年值得回顧的進展，包括於香港服務長達一百五十年的宗座外方傳教會柯毅霖神父所著 *From Milan to Hong Kong: 150 Years of Mission: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 1858-2008* (Hong Kong: Vox Amica Press, 2008)，該專書回顧該意大利傳教會自1858年派來的207位傳教士在香港的生活及工作情況，原著更同時翻譯成中文出版，可見該會傳教士對中國語文的喜愛與熟諳，亦反映出該會相當珍惜與華人社會的聯繫。另外，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於2007年開始進行關於香港天主教的口述歷史工作，作未來研究之用。範圍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歷史、天主教貞女（包括港、澳地區）、天主教教會團體及香港葡籍教友，而在2011年更由夏其龍及譚永亮兩位神父編輯一共三冊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

<sup>9</sup> 如由高隆寵修女 Sr. M Gabriel O'Mahony 所研究及整理的 *A Time of Transition: Columban Sister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olumban Sisters, Magheramore, Wicklow, 2005)，在愛爾蘭出版，只供內部參考(for private circulation only)，在公共圖書館、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圖書館均未館藏，一般教友如非認識修女或可於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圖書館借閱外，均很難可以獲得有關書籍作參考或研究之用。

<sup>10</sup> 見李志剛，〈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頁739-782。

建構出本地天主教教會歷史的新方向。夏其龍神父於1998年完成他長達531頁的博士論文，題目為*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Hong Kong [1841-1994]*，他於2014年出版由此改編而成的《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sup>11</sup>，是不可多得的參考著作。夏神父藉香港開教175年及教區成立70年，領導天主教研究中心進行「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歷史」研究計劃，為期三年。研究計劃將會從教區歷史、善會、歷史人物、鄉村傳教、教會建築及對社會的回應更全面地進行研究，方法包括口述歷史、文獻回顧、實地考察及訪談。

本期即以上述研究為題，收集了一共九篇關於這項研究的文章，作為開展研究的第一步。首篇由田英傑神父撰寫，阮志偉編譯的〈丁味略神父在香港的傳教使命與貢獻〉，該文章詳細記錄了二十世紀初宗座外方傳教會派來香港的傳教士丁味略神父在香港的傳教經歷，他對傳教的熱忱，性格及為何他仍堅持在日治時期到不受控地區傳教，結果傳說被共產黨游擊隊視作敵人而慘遭殺害的經過，填補了在香港新界西貢區的傳教歷史的空白，亦是對這位意大利傳教士的殉道行為的一種有力的肯定。朱益宜的〈中國土地上的天主教大學：中國大陸的先例與香港的前景〉探討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大陸曾出現的兩所天主教大學，即上海的震旦大學（1903-1952）及北京的輔仁大學（1925-1952）的教學理念及其實踐，藉此看看其能否作為香港的聖方濟各大學的明燈，試圖把香港最近的發展與中國天主教歷史合而為一，展望將來。陳秀嫻的〈香港天

---

<sup>11</sup> 由2005年至2009年，夏神父連同其他幾位神父或學者先後編著《香港傳教歷史之旅》小冊子一共五冊，由香港教區福傳年跟進小組出版，介紹近百年香港教會在新界的碗窰、汀角、鹽田仔，九龍的尖沙咀玫瑰堂、九龍塘的聖德肋撒堂、深水埗的聖方濟各堂，及港島花園道的聖若瑟堂、薄扶林道的聖安多尼堂、跑馬地的聖瑪加利堂等，回顧百多年在香港傳教事業所帶來的成果。

主教會的社會服務發展 (1901-2000)〉回顧香港天主教在社會服務，包括醫療、老人、婦女及孤兒等方面的貢獻。此外天主教修會投身香港社會服務亦不容忽視，善牧會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已立足香港，就是與中國局勢的轉變有關，亦回應了香港社會的需求，阮美賢的〈善牧會：服務受傷害和被遺棄的女性〉就探討善牧會如何及為何在香港成立和展開服務，從而回應了香港社會的需要，以及她們的傳信使命，提供了清晰的論述。

本地學者亦關注到天主教堂與周圍自然及人文環境的關係，去探討天主教的歷史。葉鈞頌及鄧永成的〈灣仔進教圍的空間故事〉一文從地理學角度，探討進教圍的興衰怎樣與香港的城市發展軌跡呼應，並描述這個城市社區的日常生活，從中揭示在資本主義的城市發展下，灣仔進教圍如何可以用以理解香港土地發展體制的形成過程。楊錦泉的文章〈白沙澳——客家歷史文化與天主教信仰的傳承〉藉西貢一條原居民村落——白沙澳的客家圍屋，其與早期西貢半島天主教小堂的建築特色、周邊環境與歷史關係，探究一條客家村落怎樣傳承天主教信仰及本身的客家文化。

香港近年的保育思潮增加，教區亦積極保育歷史悠久的教堂，並鼓勵教會團體透過保護文物認識堂區。然而現時很少觸及關於二十世紀初在財政緊拙下建立教堂的歷史，黃懿綦的〈中國式天主教建築在戰前香港的發展探析 (1922-1941)〉搜集了教會內外的資料，從香港獨特的歷史與景觀、教會財政及教徒需求等方面，探討直至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以前，教會本地化進程未有呈現於建築藝術上的原因，及由其後新建的功能性教堂，發展到梵二禮儀改革後再次融入中國元素以落實本地化精神的教堂設計歷程。陳天權的〈香港二十世紀天主教堂的設計演變〉一

文亦以二十世紀上半葉落成的天主教堂為例，試論這個時期的建築特色和風格演變，從中了解天主教透過建築所表達的思想。

雖然近年興起了從教友參與的角度去撰寫歷史，如堂區為慶祝主保瞻禮而編印的紀念特刊，但他們均有訪問曾經服務本堂的神父、修士或修女等，可見神父對個別教友的重要性。最後一篇文章作者林雪碧則發掘出一本於一九四六年從未出版的著作《羅馬教皇世系》，該作者是華南總修院中文教授黎正甫，於是為此撰文，闡述其內容及這位平信徒對教會的投入並不亞於任何神職人員。

這些文章的進路均反映書寫及補白香港歷史的這一角——香港天主教歷史，需經過一定的探索及範式轉移，從而提昇到更值得深思的層次。已故的陸鴻基教授指出教會歷史與傳統神學的最大觀點不同是，史學家是要了解教會團體在過往的時空所發生的事及其變化過程，其中除了呈現教會成員的變化外，亦涉及組織體系的變化、教理、思想與文藝轉變、靈修與事工、教會在歷史中於經濟活動及政治上的參與等<sup>12</sup>。我們現在的天主教會歷史研究是否已包涵了上述的元素？教會史亦有助我們從教會發展的方向或角度，調校基督徒的意義及身份定位<sup>13</sup>。希望透過這次學術的互相觀照，使天主教會在香港社會發展所擔當的角色鋪陳出來，否則教會歷史與普羅大眾的關係便變得疏離。而且一直以來，本地教徒對歷史並不太重視或感興趣，而歷史研究亦普遍地被教會視為非首要工作或問題。其實教會歷史除了是撰寫給信徒看外，也應當具備一

---

<sup>12</sup> 見陸鴻基，〈教會歷史的研究理論與方法〉（由曾家洛根據 2006 年 11 月 21 日陸鴻基教授演講紀錄而成）。

<sup>13</sup> 梁鳳玲編寫，郭偉基神父審閱，《教會史》（普及神學教材系列）（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2014），頁 1。

些與社會互動的元素，使非信徒也感受到教會為香港社會作出的努力及貢獻。我們深信牧養工作固然重要，而且應擺脫低調的處理方式，因此對前人為教會及社會的辛勞點滴作出回顧也可增進信徒的歸屬感，從而有助傳揚福音的事工及回應信徒渴望深化信仰的期盼。

在此謹向後各位曾協助此論文集的團體和個人致謝，提供有關丁味略神父的資料的宗座外方傳教會、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田英傑神父及公教童軍協會前主席梁佩儀小姐，提供有關歷史照片的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萬籟寂神父、善牧會甘秀玲修女及歷史檔案處

寄望讀者對天主教在香港發展的歷史感到加倍的興趣！

阮志偉